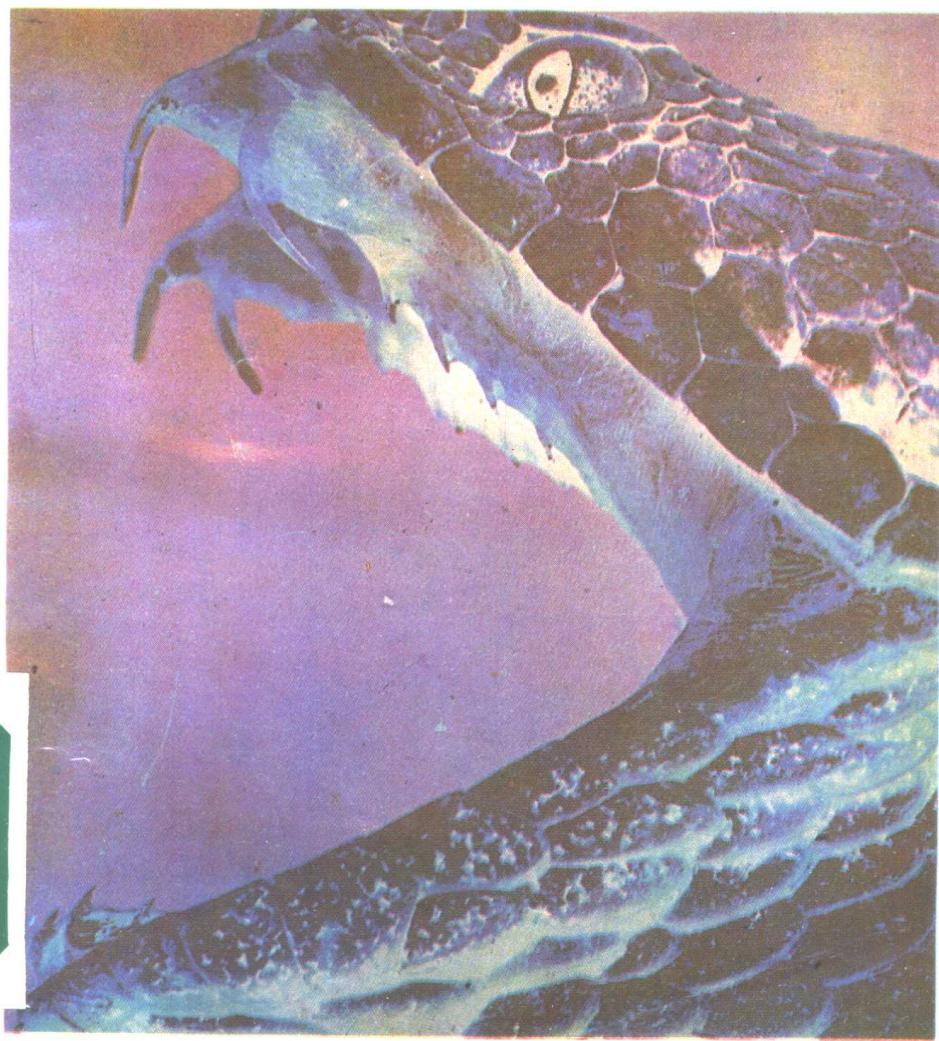


WGJSWXCS

【苏】尤里·谢尔巴克著
陈淑贤、张晓强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人类最沉痛事件之一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人类最沉痛事件之一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

【苏】尤里·谢尔巴克著

陈淑贤 张晓强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 / [苏]尤里·谢尔巴克 著
陈淑贤 张晓强 译

责任编辑：许金林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45号内）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5.875

插 页：2

字 数：125,000 字

版 次：198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2,22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089—X/13.65

定 价：1.65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的话

这里，我们把反映一九八六年四月乌克兰大地上发生核爆炸事故的纪实作品推荐给大家，目的在于使我国读者对这场震惊世界的核溢漏事件有进一步的了解。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是作家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谢尔巴克的新作。他一九三四年生于乌克兰，一九五八年在基辅医学院毕业后一直担任流行病学医生，在某研究所工作。他六十年代后期步入文坛，已有若干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问世。一九六七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如在战斗中……》。一九七四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异体排斥的屏障》。一九八〇年青年近卫军社出版了小说集《善的永恒》，主要是他创作的一组道德题材的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春他结束了讴歌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医务工作者的长篇作品《因与果》。此外，《青春》、《祖国》、《文学报》也都刊载过他的作品。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原载苏联《青春》杂志一九八七年第六、七期上。它以真实性、政论性和哲理性而先声夺人，吸引读者，作品发表后反响强烈。应当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不避艰险，身临事故现场，及时而广泛地接触各界人士，记录下了发生事故前后的真實情况。他不求雕琢，不事渲染，以纯朴的形式把事故的前前后后介绍给了读者，与已有的反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其他文学

体裁作品相比较，谢尔巴克的这部作品可谓言之凿凿，而这一点恰恰是纪实文学作品的生命所在。

在核时代，在非战争的条件下，发生了核事故，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健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怎样可以避免它？要吸取一些什么样的教训？作家以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追问；他在歌颂英雄业绩的同时，也对苟且心理、不良现象、玩忽职守和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痛加针砭，笔锋锐利，毫不留情。这部作品有论战性、有较强的专业内容，然而它却较少有说教口吻和书卷气。作家把凝重的感情、深邃的哲理、透辟的剖析丝毫不穿凿地结合在一起，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认为，谢尔巴克的这部纪实中篇《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苏共二十七大以来文学界贯彻“公开性”原则的新鲜气息，值得一读。

译者 1987岁末于天津

绝对的禁区！威严、神秘。
顿时叫人颤抖不止……
每一次我都是不寒而栗，
而且至今也不知道：
究竟是禁区如此接待我，
还是我衰弱的神经出了问题。
……
不毁坏掉周围的世界，
却又善于利用这个世界的能量——
这才称得上睿智。

——引自阿·斯特鲁加茨基和鲍·斯特鲁加茨基兄弟197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路边野餐》。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已经过去了一年。

仅仅才一年。

而浩劫前的切尔诺贝利的世界——那是静谧、从容的世界，充满自信，多年一直处于迷茫、骄纵和无动于衷的状态，如今，这个田园诗般的闲适世界已经使我们觉得十分遥远了。

对于那些与切尔诺贝利的悲剧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来说，时间犹如劈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前和四月二十六日以后。正如我们的这部叙述性作品的一位女主人公阿涅丽娅·佩尔科芙斯卡娅所讲的那样：“这和战争非常相象。我们，我们市委会的全体伙伴们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时间界限分明：战争以前与战争以后。我们常常这么说：“这事发生在战争以前。”

事故发生之后，尤其最初几个月，是最艰难的岁月，仿佛觉得时间是无限的永恒，它们可以划分成若干时代、阶段、时期、期间——随便如何划分都可以——它们被划分得泾渭分明，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特征和标志，这时间——从已经载入历史教科书、人类编年史和传说里的一九八六年乌克兰发生悲剧的春季开始，那是果园处处白花盛开和桃汛溢出河床的阳春时节，一直延续到雾霭蒙蒙的深秋为止，那个秋日，在切尔诺贝利召开群众大会，宣告第四号发电机组已经封闭在石椁之中。

一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一瞬间；一年，在任何人的一生中也不是很长的时段。然而，在这一年里，不，不是一年，仅仅只是几个月里，我们所有的人都迅速地成熟了，我们的年岁仿佛增长了整整一个世纪。我们无论对待自己，还是对待

做出重大决定的人们，掌握人们生命和大自然命运的人们都变得更加严厉、更加苛求了。我们开始根据另外的一种标准，更加严格的标准评价这几个月里所做的事情和所表现的行为，评价在我们的人民处于危难时刻，人们所表达的话语和印刷出版的文字。

因为，为了切尔诺贝利，我们已经被迫付出了，并且还要付出无比高昂的代价。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通告，对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果的巨大规模的任务做了初步总结，通告包括一些令人难忘的数字和事实，它们粗略说明在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极其复杂的工程——把毁坏了的第四号发电机组用石椁封闭在地下，这一工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的实践中都是没有先例的。

对于这一意外事故的全面领悟(象我们现在回顾伟大的卫国战争那样)——是未来的事情，也许是遥远未来的事情。任何一个作家或者记者，无论他怎样学识渊博，精通业务，他都无法在今天做到这一点。有朝一日——我坚信这一点——切尔诺贝利史诗必将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一直思索，这里我们的确是在同史诗打交道；史诗以其宏伟的规模触及人民生活重大问题：生与死、战争与和平、过去与未来)，它将充满悲怆的气氛，它将作多声部的叙述。对当之无愧的英雄们的光辉业绩将加以生动描写，对造成事故及其严重后果的罪犯们的卑鄙行径将加以无情揭露——对所有的人都要指名道姓！史诗中还要举出少量而精确的数字和实例，要展示出生活的种种环境、公务上的迷人耳目和人们希望、幻想的全

部复杂性，表现史诗中各种人物道德立场的天悬地隔。我想，为了创作这一类型的史诗需要新的途径、新的文学样式，比如说，有别于《战争与和平》或《静静的顿河》，史诗究竟将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而现在……现在，我想向读者奉献一部文献和事实、目击者叙述的独特剪辑。在事故发生之后不久，我有幸不止一次到过禁区以及与它毗连的地区。

切尔诺贝尔的爆炸把人类推进到文明发展的新时期，以前，创作科幻小说的作家只是模糊地、直觉地揣测过这一新时期的可能性。而大多数合理思维的、乐观的饱学之士和重视实用技术的人，由于他们缺乏幻想才能和由此而产生的自信心理，不可能，显然也不愿意预见到此类事情。只有个别的，最有远见的学者们最近一个时期才开始思考工业和科学设施高度集中有可能引出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这部作品发表的苏联科学院院士瓦·阿·列加索夫的发言就是一个例证。

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我们仿佛从一个时代——使用原子能以前的时代——跨入另一个未经探索的、要求彻底改革我们的思维的时代。

命运之神赐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看到了在某一个夜色将退的寂静时刻，一旦核弹头突然爆炸时，将是怎样一番情景。切尔诺贝尔的事故给人类提供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不仅有科学或技术问题，同时也有心理问题。意识难以接受和容忍这样的情况：这种致命的危险甚至无味、无臭、无色，只能借助专门的仪器仪表测量，然而恰恰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刻，或是现场没有这些仪表，或是它们不能使用。

事故表明，人如果想要生存下去，那么，就不得不强化新的

“仪表的”思维，以补充感觉器官和研究周围环境使用盖革计数管的习以为常的检测方法（例如显微镜检术、化学分析）。

放射尘的危险在切尔诺贝尔及其周围蔓延极广，它飘散在馥郁的空气里，浸入到苹果树和杏树浅粉色的花簇里、弥漫在大路和街道的尘埃里、溶化在农村的水井、乳牛的牛奶、田园的新鲜蔬菜里，在春天恬适的大自然中它是无处不在的。难道它只危害春天的大自然吗？

已是秋令时节，我在波列斯克区走访维利恰和绿色草地两个村镇，通过与村民交谈使我确信，原子时代的种种新的要求灌输到人们的意识、人们的生活之中，是何等的不容易啊！世世代代形成的那种落后的农民生活方式与 **切尔诺贝尔劫后** 世界的新的现实发生了矛盾：辐射剂量检查员讲述说苦着干草的农舍房盖上清除放射尘是最困难的工作，几乎根本无法消除。焚烧树叶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我们亲自证实了，在维利恰村，我们把辐射剂量检查仪拿到火堆旁，仪表上显示的辐射读数迅速升高，这堆火是粗心的农舍主人点燃的。您瞧，这可真是“祖国的炊烟，我们也觉得亲切香甜……”。基于这个原因，这里严禁烧木柴，有一位医生说出了一句中肯的话：在波列斯克，每一台火炉都可能变成一个小小的第四号核反应炉。所以为当地居民们运来了煤炭。

一年以前，有谁能够知道：在蘑菇上、在泥炭沼泽地上、在醋栗果上、在村舍房盖流下雨水的墙角处，都发现了高于正常标准的放射能……

由于危险难以察觉，使得一些人增加了怀疑和恐惧，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采取了满不在乎的轻蔑态度，他们故意不去理睬最简单的，应该说又是最有效的防护措施，为了显

示自己的“勇敢”而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作为代价，这一类好汉又何止是一个！

只有客观地了解真实情况，而不是被什么人“乐观”意志加以歪曲的，而不是把实情严密封锁起来；只有采取合理的防护措施并且不间断地进行辐射检测，才能够给处于危险区域的人们以必要的信心。这是切尔诺贝利不容置疑的教训之一。

来到处于紧急状态的地区，看到巨大的无妄之灾陡然降临在成千上万人的头上时，我常常回想起我们的文学界的种种辩论，诸如：当代题材、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现状及前景，正面主人公问题以及“研究”（！）生活和其他事物的必要性等此类问题。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些辩论是何等重要啊！在禁区，与这里的生活相比，那些经院式的高谈阔论相去十分遥远。就在禁区，就在此刻，我的眼前逐渐展现出从来没有见过的悲剧；现在，人的本来面貌——如同战争中一样——无比迅速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假面具骤然从人的脸上消逝，就象树叶在施用脱叶剂之后立刻全部脱落一样。如在大小会议上口若悬河似地号召“加快速度”和“调动人的因素”的那些锋芒外露的空谈家到头来却是一些平庸的懦夫和败类，恰是那些鲜言寡语、宠辱不惊的劳动者成了真正的英雄。

随便举出一个老消防队员为例，他叫格里高里·马特维耶维奇·赫麦利，人们称他为赫麦利“老伯”，他还是农民的老习惯，说话慢条斯理，我们将在本书中引用他的讲述。他和两个儿子——也都是消防队员，在核电站爆炸的时候，受到辐射伤害，分别住在莫斯科和基辅的医院里。他的妻子从普里皮亚季市附近的村子疏散到鲍罗江斯克区，在那里她仍

继续工作——做饭并且把饮食送给在田里作业的机耕队员……哪些文学问题或日常生活问题（常常是琐屑和渺小的）能够和这些具有崇高人格的人们的悲剧相比呢？我听着这位理智的乌克兰人——赫麦利的讲述，不禁回想起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

当我了解到并且亲眼看到切尔诺贝尔的悲惨情景以后，我曾经一度觉得，我将永远不再拿起笔来进行创作了。因为所有传统的文学形式、所有细腻入微的风格和精心巧妙编织的结构，这一切一切，我都觉得与事实相距无限遥远，它们是矫揉造作和添枝加叶的。在事故发生的前几天，我结束了长篇小说《因与果》的创作，小说中描述一些医生在极端危险的传染病实验室里工作，他们在与致命的疾病，如狂犬病进行斗争。虽然，小说的某些情节与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当然，这里所发生的事件的规模是无法比拟的）有惊人的巧合之处，尽管如此，这部小说在我的思想中不知怎么的，象昙花一现似地消失了，它引退了，不知退避到何处，它退居到了“和平时期”。

切尔诺贝尔占据了一切。

切尔诺贝尔宛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我向它走去，激发着我的想象力，驱使我把全副精力投入禁区的生活当中，深入到怪异的、被扭曲了的生活现实当中，迫使我去考虑事故本身及其后果，挂记着那些在医院里同死亡斗争的人们，那些距离核反应堆近在咫尺，努力去降伏原子妖怪的人们。我认为站在这一场给我的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之外袖手旁观，是卑鄙的，不可容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以前的好多年，一种负罪感久久萦绕在我的脑际，搅得我心绪不宁。我

的罪过在于，我作为基辅本地人、作家、医生，对于六十年代初自己城市发生过的一场悲剧一直置身事外，那一次事件发生在娘子谷。市领导想要修建一个娱乐场所（！），淤积在那里的河砂及河水冲毁了堤坡，泄向库列涅夫卡，造成很大破坏，有许多人丧生。乌克兰的文学界对这一事故长期讳莫如深（我也与他们同样缄口不语），只是在不久以前，冈察尔在短篇小说《黑谷》、扎格列别利内在长篇小说《南方的舒适》里分别涉及到了发生在那个早春黎明时的可怕事件……可是，我为什么沉默，其实，我也可以搜集事实，搜集目击者的叙述，可以找出灾难的直接责任者并将他们公诸于众……我没有这样做。显然，我还没有成熟到足以理解某些非常普通和非常重要的真理的那种程度。而且，是那样的一个时期，即使我发出呼吁，也不会引起注意，因为我的声音比蚊子的叫声还要微弱。那时候，我只在《青春》、《文学报》上发表过一些作品，我才发表过一部中篇小说《如在战争中……》，我诉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自我辩解，而是为了说明真相。

我对切尔诺贝利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了，我不仅把它看作是我个人的不幸（对我个人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而且把它看作是我的人民生活中继伟大卫国战争之后经历的一次最严重的事件。我如果沉默，我会永远不能宽恕自己。当然，最初我是作为《文学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出现的，我把自己的任务理解得过于狭窄：报道参加消除事故后果的医生们的事迹。但是生活进程本身驱使我逐渐扩大了探索的范围，我接触到了几百个各不相同的人们——消防队员和科学院院士、医生和民警、教师和核电站的管理使用人员、部长和士兵、共青团干部和大主教、美国的百万富翁和苏联的大学生。

我谛听着他们的讲述，在磁带上录下他们的声音，然后，整夜整夜地分析、整理这些录音。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异，这些目击者的证言真实而又坦诚，细节准确，谈到的看法切中要害。我把录音的内容进行文字整理时，尽力保留我的对话者们的语言结构、术语或习惯用语的特征和语调，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才做一些编辑处理。我觉得保存这些人道的纪实性和非虚构成分至关重要。

我渴望让真理得以原原本本地保存。

我意识到我奉献给读者的材料并不全面。这里引用的目击者的叙述基本上只涉及到事故之初，最困难阶段的情形。要知道，还有许多数不胜数的事例值得讲述呢！比如：为把核反应炉封闭在地下修建石椁的工程、清除场地上放射性污染的工作、学者们与工程师们共同探索，用极短时间在基辅地区为疏散人员建造起了五十二个新村的事迹、国家如何为事故受害者赔偿物质损失的问题，当然，也还有在禁区内忘我工作的医护人员。有多少人的命运是那样值得大书特书，有多少无名英雄啊！可是，我不认为我的工作已经结束，我还将继续搜集资料，最后完成这部作品。

切尔诺贝利——一个苦涩的词

切尔诺贝利。

这是乌克兰的一个小镇，可爱又很普通。它淹没在密菁草丛、苹果树、樱桃树的树海之中。夏天，许多基辅人、莫斯科人、列宁格勒人喜欢在这里休息。他们精心安排到这里度假，经常是全家老少，整个夏季都住在这里，他们租下“别墅”，不！那只是租下木结构平房里的几个房间，腌制冬天吃的东西，做果酱、采蘑菇（这里的森林里蘑菇多得俯拾皆是）、在基辅海滨光洁耀眼的沙滩上晒得黝黑，还去捕鱼。仿佛在这里，波列斯克大自然的绮丽风光与在切尔诺贝利以北不远地方，藏在混凝土里的核电站的四台发电机组是那样惊人地和谐共存，密不可分。

只是仿佛而已……

一九八六年五月初，我（难道只有我？）来到切尔诺贝利，似乎看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难以置信的世界。这个世界涂抹着前所未见的（因而也就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辐射能大大高出正常标准的阴暗色调。我看到了不久前就是在最富于幻想意味的梦境中也想象不出的情景，尽管一般来说，一切看上去都异常普通。后来，我又几次到过那里，一切已经变得习惯了……

但是，第一次看到却是……

这是一座空城：没有居民，没有孩子们清脆的喊声，没

有区里固有的那种不慌不忙的常规生活，户窗板紧闭，所有住宅、机关和商店都锁上了门，贴上了封条。在消防队附近五层楼房的阳台上还放着自行车，晾晒着衣服。这座城市里家畜已经无影无踪。清晨，再也听不见乳牛的哞哞叫声，只有几条野狗跑来跑去，几只没有人照料的母鸡咕咕叫个不停，还有小鸟无忧无虑地在枝头上啾啾。鸟儿们并不知道，在那些日子里，落满灰尘的树叶是保留高浓度放射能的地方。

但是，甚至已被居民放弃的这座城市并不是死城。它仍在生存，在搏击。不过，是按照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绝对崭新的原子时代紧急状态下的严峻法则生活着。城内和城郊集中了大量机械装备：大功率的推土机和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和铲运机、开沟机和混凝土车。党的区委会对面，列宁纪念像旁边停着一辆装甲运输车，里面坐着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年轻士兵，他正在向外张望。在斑斑点点的伪装网下面整齐排列着无线电台和军用卡车。在战役指挥中心——区委会和区执委会门前停着数十辆小轿车：黑色的“伏尔加”和“海鸥”牌汽车，就好象是这里正在召开高级会议。这些汽车中有一部分由于“吸收了”放射能，而不得不永远弃置在禁区内……在通向切尔诺贝利交通要道的各个路口上设置很多辐射剂量检查站，对汽车和拖拉机进行严格检查，身穿绿色防化服的士兵在专用工作台上清除从禁区内开出来的车辆上的放射性污染。不停止地，毫不吝惜地洒水冲洗切尔诺贝利各条街道。国家汽车局的大批调度员站在大路上，使人想起在节日前夕基辅的繁华热闹的干线上站满指挥交通的人员那样。

这个有幸进入二十世纪编年史的小城，它有着什么样的

历史呢？

一本薄薄的小书摆在我的面前，准确地说，这是一本装帧精致而样式古旧的小书。它出版于一八八四年，距今一百多年以前。小书的书名对于当今读者很有吸引力：退役军人 Л·П·所著：《基辅省的切尔诺贝利城》。

作者具有真正军人的那种一丝不苟的素质，闲来无事，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于是，他悉心研究了位于基辅以北一百二十俄里这个非行政中心的县辖小镇的地理、历史和经济状况。Л·П·写道：“昔日的历史学家讲述说，当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之子基辅大公穆斯基斯拉夫于一一二七年派自己的弟兄们分四路反抗克里维奇人时，命令弗谢沃洛德·奥列格维奇经过斯特列热夫进取鲍里索夫城。斯特列热夫是波洛茨克公国最南的一个小城，大约在一六〇年罗格沃利德派弗谢沃洛德·格列勃维奇去镇守，这位大公执政时期，后来被叫做切尔诺贝利的斯特列热夫是分封的公国。”

编年史中记载，一一九三年斯特列热夫已更名为切尔诺贝利。史书中说：“基辅大公留里克（1180—1195年执政）之子维什哥罗德和图洛夫大公罗斯季斯拉夫‘带着猎获物从切尔诺贝利去托齐斯基’。

作者翔实地、生动地描述切尔诺贝利复杂的历史沿革——它可真是几易其主！十七世纪末切尔诺贝利落入波兰军事长官大封建主霍德凯维奇之手，直至十月革命为止，那里有两万余俄亩的土地被霍德凯维奇家族占有。

切尔诺贝利——这个地名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篇章中也曾经有过昙花一现的瞬间闪现：雅各宾党人专政时期，一个名叫罗扎丽娅·柳芭米尔斯卡娅—霍德凯维奇的切尔诺贝利